

神圣与日常

——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十二届大会“比较文学与宗教研究”圆桌论坛综述

The Sacred and the Everyday:
A Review of th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Religious Studies” Roundtable of the XXII
Congress of ICLA

赵 倩

ZHAO Jing

作者简介

赵倩，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ZHAO Jing, Assis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zhao.jing@ruc.edu.cn

Abstract

Th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Religious Studies” Roundtable of the 22n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ICLA) was held at the University of Saint Joseph, Macau, China, from July 30-31 2019, under the theme “the Sacred and the Everyday.” 23 scholars from various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in Austria, Belgium, France, Hong Kong, Macau, Mainland China, the UK and the US were invited to present papers. During the two-day meeting at the historic Seminário de São José, a range of issues were discussed by participants, from 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to everydayness, postmodernity, ritual studies, Confucian-Christian dialogue, Sinology and English and European literature. This review outlines the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Roundtable and their major findings.

Keywords: sacred, everyday, literature, theology, ritual

导言

2019年7月29日至8月2日，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十二届大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隆重举行。大会下属圆桌论坛“比较文学与宗教研究”，由圣若瑟大学宗教研究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学院共同主办，于7月30日至7月31日在圣若瑟书院顺利举行。本次圆桌论坛主题为“神圣与日常”（The Sacred and the Everyday）。与会学者分别来自澳门圣若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美国范德堡大学、美国耶鲁大学、英国阿斯顿大学、英国格拉斯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澳门利氏学社等高校或研究机构，他们相聚于见证过数百年中西交流史的圣若瑟书院，共发表23篇学术演讲，话题遍及人文学及神学研究的广大领域，并据此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学术对话。

经历了世俗化祛魅的20世纪，反而在人文学领域见证了针对“神圣”（the sacred）的强烈兴趣。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奥托《神圣的概念》（1917）、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1957）、阿甘本《神圣人》（1995）等名著，分别从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政治哲学等角度探索了“神圣”。神圣之维，不仅从未消退，反而展现出其对于现代生活的极大暧昧性与相关性。与此同时，20世纪亦对“日常”（the everyday）予以了前所未有的浓烈关切。伍尔芙试图在小说中传达日常生活的“非存在”（non-being）；乔伊斯在一位都柏林市民平凡的一天中重写了《奥德赛》；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存在论分析实以“常人”（das Man）为经验根基；列斐伏尔、塞尔多、佩雷克、布朗肖为日常生活提供了更为深刻而详细的理论批判，也揭示了日常生活在克服虚无主义的努力中所孕育的希望。本次圆桌论坛即着眼于此，借助与会学者的学术工作，望能重审经

典、融化新知，让神圣与日常相互烛照、彼此通达。论坛分为两天举行，共分为四组对话。

一、人文与宗教之间的中西质辩

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教授的开场演讲题为《在“圣-俗”与“有-无”之间》(Between “the Sacred / the Everyday” and “Being / Non-being”)。杨慧林以译语辨析、中西格义、概念互诠的方法切入了神圣与日常之辩，以灵动而不失细腻的笔法穿梭于传教士的译介、现代哲学家的论说与佛经的妙论之间，对诸如“道”“事件”“世界”“存在”“有”“无”等概念展开了精密的哲学探讨。老子之“道”与《约翰福音》中耶稣自谓之“道”(via)已经贡献了无尽的对谈，杨慧林更将其拓展至传教士所未注意到的存在论维度，分析了“我是我所是”这一旧约经典议题在翻译与哲学中的可能意义。论文征询了海德格尔、朱利安、理雅各《论语·八佾》“祭如在”章译文等资源，探讨了中西语境中“存在 / 非存在”与“有/无”等概念的微妙差别，指出“语言的结构和字义本身已经注定了思想”。当代哲学家扎巴拉(Santiago Zabala)试图以“踪迹”“事件”“留存”等“弱概念”推进传统西方哲学的存在论进路；而在杨慧林看来，诸如“祭如在”，大乘佛学“缘起有”“自性空”“宛若有”之辩，以及多义之“道”等侧重于“关系性存在”的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不仅呼应着扎巴拉的“两种抵抗”，更能在这场跨文化哲学思考中寻得一条切近的道路。

圣若瑟大学校长薛沛德教授(Peter Stilwell)的报告《“日常”的启示——文学与灵性的交融之境》(Revelation in the ‘Everyday’: Where Literature and Spirituality Converge)广泛从上世纪旧约学术(尤其是奥尔特[Robert Alt]关注文学性的研究路径)汲取营养，将神圣与日常之辩敷衍于圣经文学的舞台之上。薛沛德指出，古犹太民族的历史同时具有“强烈的神性”与“强烈的人性”，上帝不可以形象表征，

关切的目光必然投向了历史舞台上的凡人；而在文学的叙述中，神圣上帝与凡俗世人却享有一项共通的能力，即善于作出改变。他着重分析了《创世记》中雅各与以扫的故事，两兄弟之间的争吵、离析乃至多年后的重逢和解，这些部落先祖的传说与趣闻，内容大多为家庭庶务，似乎只充当着神学义理的间奏、缘饰或背景，但在薛沛德看来，唯有依托平凡的家庭生活叙事，方能照见神圣的光采。

范德堡大学威廉·弗兰克（William Franke）教授以其论文《后现代的骈辞：超世俗性还是宗教回归？》（*Amphibolies of the Postmodern: Hyper-Secularity or the Return of Religion?*）呈现了他对后现代性的全面回顾、分析与诊断。现代技术的发展推进，销蚀了诸如自然、真实等客观性概念，与此同时，人类的主体性在不断向世界拓殖的过程中，反而经历了愈发深刻的非人化危机，而这正是许多关注“绝对他者”的后现代哲人的思想基点。弗兰克分析了两种“后现代”——“现代主义”的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的后现代。前者强调更新传统，强调奠基性的“此时”（modo，也是“现代”[modern]一词的来源）；后者则消解了诸如自我、此时、法则等一切根基。此处，后现代性显示出深刻而悖谬的二重性：一方面，其超世俗性排斥超越、驱逐宗教；另一面，其无根基性又强烈呼唤着某种无限他者。故后现代在此展现为“后世俗”，为宗教神秘的返魅开辟了空间。

圣若瑟大学刘伟杰（Cyril J. Law, Jr.）教授的论文题为《同一信仰传统中翻译两大思哲的跨文化互动考量——以若望·亨利·纽曼与马相伯为例》（*Translating Two Minds in the Tradition of One Faith: Considerations of Intercultural Dynamics in the Parallels of Joseph Ma Xiangbo and John Henry Newman*）。两位天主教文化巨擘马相伯与纽曼虽不曾相识，却各自成为中英学界中地位卓著的作家。纽曼主持编译的《金链——四福音书集解》（*Catena Aurea: Commentary on the Four Gospels, Collected out of the Works of the Fathers by St. Thomas Aquinas*, 1841）与马相伯主持编译的《新史合编直讲》（1903），两

部倾力之作亦有极其相似的宗教初心。经过对翻译原则、文本形制、译语拣择等方面的比较，刘伟杰提出，《金链》与《直讲》所共享的重大题旨有三：1) 凭理性而细致的分析，探索经文中的隐义；2) 注重历代教父在释经学中的贡献；3) 培养深刻植根于神学（与礼仪）之中的圣经研究，促进“求知的信仰”（*fides quarens intellectum*）。刘伟杰认为，在宗教发展的进程中，对待各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纽曼与马相伯皆秉持现实而持中的态度与方法，并以个体学术人格介入现代性的诸多宗教与社会议题之中，以期达致文化与信仰的和谐之境。

香港中文大学赖品超（Pan-Chiu Lai）教授为论坛奉上了长文《“即凡而圣”抑或“即圣而凡”——耶儒比较中的超越与内在问题》（“The Secular as Sacred” or “The Sacred as Secular”? The Problem of “Immanence vs. Transcendence” in Christian-Confucian Comparison）。上世纪牟宗三先生的判教思想影响甚大——即基督教提供“外在超越”，儒家则主张“内在超越”，故耶教为离教，儒教为圆教，后者优于前者。赖品超着力批评了这种思想定式，并全面梳理了圣经经文、早期教父、中世纪神学、新教神学、现代神学家（纽曼、坦普尔、蒂利希、巴特等）所呈现的思想面貌，认为在基督教传统中超越与内在历来存在相互兼容、相互渗透的关系，而这种关系集中体现在三一性的教义之中。最后，他指出牟宗三等现代学者对儒家的拔擢及其对基督教的不尽理解可界定为一种“逆向东方主义”；化用芬格雷特（Herbert Fingarette）对孔子的评价（“即凡而圣”），论文以“即圣而凡”四字总结了基督教传统中的超越与内在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李丙权教授的报告《天人之间——儒耶对话反思》（Between heaven and mankind: A Reflection on Confucian-Christian Dialogue）对儒耶对话进行了全面的回顾，提炼出若干问题，并结合学界新知，在更深的层次上介入了这场对话。李丙权援引《荀子》，提出中国各宗教中存在的二元性结构；他又以新的视角分析了诸如“天”“超越/内在”“成神”等儒耶对话中的重要概念，澄清了许多长

期存在的误解。此外，他还借助“巫”“礼”“仁”的演变及中国民间宗教等较新议题，重新评估了儒家的宗教性。最后，李丙权指出，儒耶对话应以现象学的方法关注日常生活中真正的宗教经验。

二、文学艺术中的神圣与日常之思

在题为《拯救灵魂——在沉浸于世俗的当日常世界中对文学之神圣与灵性的跨文化探讨》(Saving the Soul: The Cross-cultural Search in Literature for the Sacred and the Spiritual in the Perceived Secularity of the Modern Everyday World)的论文中，格拉斯哥大学贾斯珀(David Jasper)教授以文学如何“拯救灵魂”为主旨线索，紧扣了会议主题。“灵魂”在圣经文化中(如文中提到的“圣母领报”故事及以此衍生的艺术作品)是联系天与地、神性与世俗的枢纽，又被赋予了比“整个世界”更为重要的价值(太16:26)。20世纪牛津大学文学教授乔治·戈登(George Gordon)和中国作家鲁迅似心有相契，分别于1922、1923年各自发出了以文学拯救灵魂(或精神)的疾呼。贾斯珀循此题旨，探索了《灵山》与《芬尼根守灵夜》两部作品。文章结论认为，文学语言的含蓄似有所指及作品的文化根基是联系神圣与日常的桥梁；虚构作品所能提供的拯救，其核心在于“世俗的神圣性”。

中国人民大学陈涛教授的报告《神圣面容——数字时代的特写镜头》(The Sacred Face: Close-ups in the Digital Age)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在电影学领域贯彻了本次圆桌论坛的主旨与关切。陈涛分析了电影史中的三种面部特写镜头。模拟时代的特写镜头让嘉宝呈现在荧屏上的面容具有了某种超出一切线条之总和的神圣品格，因而也成为了罗兰·巴尔特神话学的分析对象；而在数字时代，以动态捕捉和电脑成像(CG)技术制造出的面容，因其过度的人造真实反而激发了“恐怖谷效应”；而在纤毫毕见的120帧特写中，日常的人类面容重新获得

了某种近乎神秘的深度。

在基督教图象传统中，圣象常包裹于杏核状的椭圆光轮之中，称为“曼朵拉”（mandorla）。围绕这一核心形象，圣若瑟大学宗教学院院长摩根（Stephen Morgan）教授的论文《作为曼朵拉的礼仪文本——往返于神圣与日常之间的窗口》（Liturgical Texts as Mandorla: Windows from the Everyday to the Sacred, from the Sacred to the Everyday）展开了一场跨文化、跨宗教、跨媒介的学术探索。摩根认为，造于公元8世纪的日本奈良东大寺二月堂本尊十一面观音像身后的圆盘雕饰，构成了出入欲界、色界与无色界的切口，而这与基督教传统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可追溯至一副创作年代不晚于5世纪30年代中期，至今仍保存在罗马圣母大教堂（Basilica di Santa Maria Maggiore）中，被称为“幔利橡树”的镶嵌画作品。作品中环绕天使的蛋形光彩，日后发展为耶稣圣象周身的曼朵拉，并在图象学意义上成为了联系神圣与日常的窗口。在摩根看来，曼朵拉视象的逻辑结构，不仅与盛行于东教会的否定神学逻辑相契，亦与西教会诸多神学思想（如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第二教规——“造物者与造物之间最大的相似，只在于他们之间没有更大的不相似”）暗和。而基督教的礼仪凭言辞、容止与行动唤起“荣耀”（kabod, δόξα, gloria），此即神性的在场，文辞的曼朵拉。此外，摩根对东西教会几种礼仪文本展开分析，探讨了在言辞中生成荣耀的具体机制。

耶鲁大学司马懿（Chloë Starr）教授的报告题为《救赎日常中的世俗——北村的小说〈施洗的河〉》（Redeeming the Secular in the Everyday: Bei Cun's The Baptizing River）。在简要回顾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神性写作”潮流及其社会、文化、学术背景之后，司马懿着重探讨了《施洗的河》（1992）的主旨、结构与人物经历，并对其中关于道德论、神正论、洗礼等问题予以具体分析。对于作家本人，曾经神圣的文学如今只提供怀疑与焦虑，或许并非终极的解药，但在小说中，苦难的叙事有如肮脏的河，为人施洗的或许正是这样一条叙事之河。

最后，司马懿评估了小说的优点及要义——将宗教带入文化公共空间、关注灵性缺失下的社会病症、适度运用先锋派小说手法；也指出了小说的若干不足——失真、突兀、说教过多而贫于对话。

中国人民大学赵倞博士的论文《世间的具象——世界图象识略》(The Profane Figure: A Brief Survey on World-images)从“世界图象”(Weltbild)概念出发，分析了海德格尔借此对现代性展开的总体批判，并探讨了其中基督教的微妙存在。世界图象的概念可追溯至保罗书信，这一资源恰好在与海德格尔同时代的两位重要犹太裔学者奥尔巴赫和本雅明那里得到了发扬。赵倞以为，奥尔巴赫与本雅明意义上的形象化、具象化(bildlich; figural)的分析方法，或能化解海德格尔意义上世界图象的僵固不化。文章依据阿甘本对民俗文化中“圣诞景”的阐释，提出了这一思想在文学、艺术中的实例。

中国人民大学汪海教授的报告题为《布朗肖论作为极限经验的日常生活》(Blanchot's Notion of the Everyday as the Limit-Experience)。上世纪法国思想界，列斐伏尔领衔了一股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思潮；实际上，日常理论可上溯至伍尔夫与海德格尔，前者认为日常生活是包含大量的“非存在”，如同一团“棉花絮”；后者强调日常处境的“常人”“沉沦”状态。论文进而从“晦暗”“不可见”“无事”“厌倦”等概念入手，缕述了布朗肖对日常性的深刻分析。作为一种极限经验，日常意味着一种不生不死的“永恒虚无”(éternullité)。汪海指出，经历着虚无主义的日常生活怀疑一切价值、批判本真与非本真的不合理差异，因此它保存了一种自我批判的原则，并孕育着希望。

三、欧洲文学、传教士与汉学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大学史晓丽博士的论文题为《考狄利娅之孝的宗教解释》(A Religious Interpretation of Cordelia's Filial Piety)。她首

先以“圣方济各祷文”（*Prayer of Saint Francis*）立意，借助祷文的宗教逻辑，着重分析了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中小女儿考狄利娅具有自我否定性质的孝爱（*filial love*）；如同祷文所云“人凭死而生于永恒”，考狄利娅也因苦难而成圣。史晓丽进一步将《李尔王》中父女之间家庭纷争的理解为一种争夺权威的游戏，并以此为例分析了中国当前的家庭模式；她将关切的视线投向了养老、住院护理等切实社会问题，探索了考狄利娅之孝所能提供的助益与启迪。

在题为《傲慢与偏见：简·奥斯汀与经文辩解释学》（*Pride and Prejudice: Jane Austen and the Hermeneutics of Scriptural Reasoning*）的会议论文中，伦敦圣玛丽大学汉考克（Christopher Hancock）博士以知人论世的方法，详细探讨了简·奥斯汀所处身的世界，并广泛发掘材料，重估了潜在于奥斯汀生命之中的不断发展深化的宗教观念。汉考克认为奥斯汀小说中的内向思考与叙述者议论等特色，营造出细致而立体的文本解释学效果，不起眼的生活琐事成为了塑造个性、培养道德、构建家庭乃至于发现永恒的原材料。奥斯汀笔下人物面向他者的自我觉醒，卑躬倾听的姿态，在日常生活中对理性宗教的持守，亦会对经文辩读形成莫大的资助。

会议宣读了澳门圣若瑟大学刘钰馨（Jenny Oliveros Lao-Philipps）教授的论文《彼得·谢弗戏剧中的仪式与神圣》（*Ritual and Sacred in Peter Shaffer's Theatre*），将神圣与日常之辩延伸至戏剧文学的领域。英国戏剧家彼得·谢弗志在将希腊戏剧恢复于现代舞台之上，不仅广泛借鉴了前者的古代形制（面具、歌队等），更深入引进其精神意涵（仪式、宗教、正义与复仇的主题等）。在刘钰馨所着重分析的三部作品中——《皇家太阳猎队》（*The Royal Hunt of the Sun*）、《马》（*Equus*）、《戈尔贡的礼物》（*The Gift of the Gorgon*）——却享有一个共同题旨，即将仪式与崇拜引入日常生活，追问生命的意义与神圣的终极。此外，在刘钰馨看来，后两部作品中的两位主人公实则寄托了谢弗对戏剧形式本身的思考。《马》中的精神病医生马丁对自身平

庸资产阶级生活的反思，透射出现代戏剧在灵性维度的缺失；而《戈尔贡的礼物》中剧作家的失败自杀，更反映出晚年谢弗对古希腊仪式戏剧及复仇伦理的超越与更新。

在题为《程抱一作品中的神圣与人生》(The Sacred and its Connection to Human Life in François Cheng's work)的论文中，独立学者吕茜·贝尔尼埃(Lucie Bernier)，以神圣如何映照人生为着眼点，呈现了一篇关于20世纪法国知名学者、首位华裔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的简要学术传记。文章提出，早年的漂泊让程抱一感受到一种形上意义的失语体验，这促成了他追问存在，并成为了文化的承载者与转渡者。程抱一于1969年皈依基督教而易名为“François”，其名古义正为“法国”，又让人联想到阿西西的方济各。恰如儒家有“天、地、人”，道家有“阴、阳、空”，人是“身、魂、灵”的综体，贝尔尼埃也以道家、儒家、基督教的三元结构来解释程抱一的灵性经验，其中基督教对他而言“并非一种信仰，而是一种对于基督人格的亲近、一种完全的友谊”。

闽江学院雷阿勇教授撰文《理雅各“故土叙述”之神学诠释》(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James Legge's “Fatherland Narrative”)，借助19世纪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的自传及旅行记述，重访了理雅各的家乡亨特利(Huntly)及其附近的巴基(Buckie)海岸、广东西江沿岸(如肇庆飞水洞)、北京天坛、香港岛等地；与同时期其他作家的记述不同的是，自然风光在理雅各内心引发了一种混合着“锡安山的壮美”和“伊甸园的优美”的宗教情感。雷阿勇认为，理雅各的性灵成长及宗教信仰的最终建立，与自然风貌的陶冶休戚相关，而这潜藏的儿时日常留下的神圣烙印，与随后理雅各漫长的传教、学术生涯交织，不时以某种方式或面貌显露。此中潜藏着一种上帝普遍存在的自然神学思想，这种思想将其早年所受严苛的加尔文神学训诫打开了缺口，并最终反映在“他晚年对于那些奇异陌生的中国经典的解释之中”。

四、经典再诠与礼仪反思

奥尔巴赫曾说“崇高与日常生活不仅在实际上相互关联，而且在根本上不可分割”。中国人民大学张靖副研究员的报告《耶稣比喻中的神圣与日常》(The Sacred and the Everyday in Jesus' Parables)为这一判断提供了明证。“比喻”(parable)源于七十子译本用来翻译希伯来语“mašal”的希腊译语“παραβολή”，其背后存在繁复的文法传统。福音书中的耶稣却以独特的风格运用了传统的“比喻”。同观福音书出现的约40次比喻，虽指向天国的奥秘，却无不取材于加利利鲜活的乡村生活(撒种、杂草、芥子……)。比喻呼唤着解释，自古代教父以降，寓意解释法影响最大，然而其结果却是神圣与日常的截然对立，后者在前者的权威下只有工具性的地位。张靖指出，后世俗时代的学者应以神圣与日常彼此的“双向谦卑”为阅读立场。在此视野下，她借鉴了几位学者(如克罗桑[John Dominic Crossan]、阿甘本)的观点，认为耶稣的比喻邀请读者颠覆世界，学习过一种没有神话的生活，它揭示而不毁灭奥秘，把天国拉到近处，重建人类的生活与关系。

鲁汶天主教大学梁展熙博士(Andrew Chin Hei Leong)以《无往不复？——中国古代文献与希伯来圣经中(神圣)报应的(非)存在》(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The (Non-)Existence of (Divine) Retribution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Hebrew Bible)为题，展示了对于复仇与报应问题的跨文化思索。梁展熙从中希古代文献(如《论语》《道德经》《孟子》《摩西五经》《箴言》等)梳理出有关报应问题的记载，提炼出二者在同态复仇法(*lex talionis*)以及源于超越者的自然报应这两点相似因素；接下来，又着重探讨了中、希传统文献中对神圣报应问题各自的肯定与否定态度。梁展熙对于希伯来传统中

的神人辩证与中国先秦思想中的天人概念予以语境化思考，并对有关报应文献的措辞、理路、意象进行了具体分析，投射出一种比较神学的视线，展示了两大传统在世界观、神圣观上的异同。

澳门利氏学社罗世范（Stephen Rothlin）教授的报告《借依纳爵良知省察探索日常生活中的神圣》（Exploring the Sacred in Daily Life through the Ignatian Examination of Conscience）独具一格。法国年鉴学派在研究长时段历史时赋予日常生活以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罗世范将这种注意力转移到宗教和文学领域。依纳爵·罗耀拉《灵修》的日常省察由五个步骤构成，充分运用感官，察觉神圣，最终聚焦于避静修习者的良知。这一经验亦被罗世范创造性地运用于解释不同文化中的诗歌，在诗句所崭露的日常经验中探察神圣。英国耶稣会士诗人霍普金斯（Gerard Hopkins）在《上帝之壮美》（God's Grandeur）一诗中，在“震动箔片的闪光”（shining from shook foil）、在“浓油滚滚之流”（ooze of oil crushed）中见证了神圣壮美，其经验之源泉则在于“一代又一代人走过、走过、走过”（Generations have trod. have trod. have trod.）的日常生活；古希腊诗人阿尔凯奥斯描写宙斯降天雨，以蜜酒注入祭供，为神庙铺下柔软的羊绒簟枕（ὕει μὲν ὁ Ζεῦς [...] ἐν δὲ κέρνατις οῖνον ἀφειδέως μέλιχρον, αὐτὰρ ἀμφὶ κόρσαι μόλθακον ἀμφὶ [...] γνόφαλλον），微妙从容的喻象与诗趣，反而彰示了自然之神性；李白《早发白帝城》将“两岸猿声”留在千里之外的身后，以一日的行程与耶稣会传统的日常省察形成了遥远的呼应；墨西哥诗人帕斯（Octavio Paz）《太阳石》（Piedra del Sol）中所歌唱的被称为“纯贞”的无形之花，在日常的每时每刻歌唱着其花冠的孤独、水晶的花瓣（Mejor la castidad, flor invisible / [...] canta la soledad en su corola, / pétalo de cristal en cada hora）；而脱去面具世界的中心，则有无名、无状的上帝在震颤（el mundo se despoja de sus máscaras / y en su centro, vibrante transparencia, / lo que llamamos Dios, el ser sin nombre, / se contempla en la nada）。罗世范总结指出：应超越启蒙主义对宗教的简

单化理解，凭诗歌的日常可察觉神圣，并从中总结出一套真正的“启明”（Aufklärung）语法。

教宗本笃十六世于2009年颁布使徒宪令《圣公会的联结》（*Anglicanorum coetibus*），允许英国圣公会中的神职人员及俗信徒加入天主教，建立“个别教长辖区”（personal ordinariates）。在此背景下，维也纳大学詹姆斯·布拉德利（James Bradley）博士的论文《文本-社群-身份——作为保存礼仪文本计划的〈崇圣〉》（*Text-Community-Identity: Divine Worship as a Project of Liturgical Text Preservation*）详细回顾了自亨利·纽曼、经保罗六世、直至本笃十六世期间英国圣公会与罗马天主教廷之间协作、和解的历史进程。宪令颁布后，罗马教廷信理部与礼仪圣事部协作成立了“英国圣公会传统”工作组，编撰旨在保存圣公会礼仪传统的《崇圣——礼仪拾零》《崇圣——弥撒》等书。布拉德根据目前可获取的文献，又对工作组编撰《崇圣》的工作原则进行了详细释读。收录的文本有三类：1) 源于英国国教礼仪文献的文本或译文；2) 见于英国国教礼仪文献，而经过改编、调试的文本；3) 不见于英国国教礼仪文献的新创或新译文本。而三类文献的编选原则中各自存在着微妙的疑题：比如，当所选文本中出现与天主教教义相扞格的情况时，如何处理才能保证文本原意的完整？改编与调试，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主观性，能否保存了原文化的连续性？新编译的文本，其原文选取、翻译过程，亦值得追问。布拉德利最后指出，编撰《崇圣》的根本意旨在于为个别教长辖区提供礼仪生活，存续传统、滋养性灵，在具体处境中指出了一条知性的路途。

在天主教传统中，时辰礼仪（*liturgia horarum*）在日常中沟通圣俗，因而殊为重要。来自礼仪英语国际委员会、主持罗马日课经翻译工作的华兹沃思蒙席（Monsignor Andrew R. Wadsworth）撰文《神圣时间-神圣文本——罗马教会礼仪文本中时间的神圣化》（*Sacred Time-Sacred Text: the Sanctification of Time in the Liturgical Texts of the Roman Rites*），对此问题予以理论化的思考。奥古斯丁曾谈到时间的奥秘

性质：它从尚未存在的未来走来，经过不具备广延性质的现在，走向已经不再的过去；而时间的实存又系于三种“现在”：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未来的现在。而这种基督教时间观的根基在于希伯来传统。创世纪叙中最先被神圣化的是时间——上帝将第七日“定为神圣”（创2:3），优先于人与空间。华兹沃思仔细重读了晚祷（Vespers）、三时经（Terce）、六时经（Sext）、九时经（None）、静夜颂（Compline）中的几种颂诗文本。宗教日课将日常时间神圣化，使得十二时辰与人生的少壮老死相应，亦有“仿效基督”（*imitatio Christi*）之意。时间的神圣化在自然生命之外启发了超自然的生命——颂诗云“侈与韶光赠暮日”（*largire lumen vespere*），表征出黄昏的启示性以及灵性的恩宠。文末借本笃会女修士萝尔（Aemiliana Löhr OSB）的论断指出，在现代人线性流逝的时间观之上，古人循环往复的时间观念为现世注入了永恒，构成了宗教崇拜的根基。

英国阿斯顿大学萨德洛（Brian Sudlow）博士的论文《从日常技术到不可说的极限——切斯特顿与哈扎吉》（From Quotidian Technologies to Unspeakable Limits: G. K. Chesterton and Fabrice Hadjadj）对两位高产的天主教作家——英国的切斯特顿与当代法国的哈扎吉——进行了全面比较。二人虽然不属于同一时代，却都是涉猎广博的作家。切斯特顿是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哈扎吉的戏剧创作与艺术批评屡获褒奖。二人的相似更在于文学气质：譬如，切斯特顿将圣方济各形容为世人的小丑，而哈扎吉则将基督徒描述为在无限面前手足无措的小丑——“上帝的杂耍艺人”（*jongleur de Dieu*）这一共同主题亦激发了后世俗视角。此后，作者又以切斯特顿的一篇小文《火车的秘密》及哈扎吉的《复活说明书》为例，剖析了二人关于神圣与日常的思辨：前者从日常中隔绝出一可启发思想的事物，以此寻找通向神圣的途径；后者则认为复活者应从神圣回归平凡。